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英国力量演变： 一项研究议程 <<

王展鹏^①

英国是西方近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19世纪到20世纪初曾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经历了20世纪的霸权衰落后，今天仍是具有重要全球和地区影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英国的国际地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课题。二战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英国失去了帝国地位，但还未找到自己的位置”。^②事实上，直至今日，这一关于英国国际地位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英国是怎样的力量”。国际关系学者围绕英国是大国还是中等力量国家、是“全球力量还是地区力量”争论不休。在当今全球化的收益和风险并存、国内治理与对外政策的界限日益模糊的背景下，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设定更广义的跨学科的英国力量研究议程，将注意力不仅局限于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及其呈现形式的层面，而且要关注

①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教授。

② D. Acheson, “Our Atlantic Allianc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trands”, *Vital Speeches*, 1963, Vol. 29, No. 6, pp. 163-164.

英国内部的力量资源、力量认知等要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国面对内外部诸多挑战做出的回应，如战后首次出现的联合政府、危机下英国经济的艰难转型、苏格兰独立公决启动、英国是否保持其欧盟成员国地位等对于英国力量演变的未来走势，特别是英国能否有效摆脱进一步衰落的命运，维持全球大国地位至关重要，将在英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显现出特殊意义。

一、英国力量：类型、认知与表现形式

回答英国力量性质的问题，首先应从英国力量的资源、内外部认知及其呈现形式等层面来考察。基于这一认识，在国际关系研究关于国家力量的诸多分类中，政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区分可以有效整合关于英国的物质、制度和文化资源及其与对外战略间关系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英国力量演变的走向及其国际影响。

（一）政治/军事力量

英国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人往往以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300多年国内政治体制相对平稳发展而引以为豪。按照钱乘旦和陈晓律先生的说法，“英国政治制度是几乎所有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母体，”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制度遗产今天仍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①在当今世界，成功的国内政治与公共政策实践日益成为国家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的潜在资产。二战以后，英国基本保持了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福利国家成为英国人支持度最高的重要制度。但与此同时，其政治传统和政策安排也面临着如何提高决策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

在国际政治层面，英国决策者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认为英国自身具有充

^①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当全球大国的“巨大的资产和优势”，其中既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北约中的领导角色、英美特殊关系、欧盟大国地位及其居世界前列的军事力量，也包括全球贸易大国地位和英语这一世界使用者最多的语言带来的红利。^① 在多边组织和全球治理层面，英国利用历史上形成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充当议程设定者，并扮演世界主要援助国的角色。在安全方面，21世纪初，英军仍是世界上能够在全世界投放军力的大国之一。在2010年英国《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SDSR)中，联合政府尽管提出削减防务预算的目标，但依然高调宣示，承担全球责任、发挥全球影响是英国政府始终恪守的承诺。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在一个国际力量转移、威胁逐渐增多的世界，英国如不能扭转力量衰落的局面，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将大为削弱。

(二) 经济力量

20世纪开始时，大英帝国的人口占全球总数的1/4，其本土和殖民地面积有约3367万平方公里。虽历经衰落，英国的经济力量仍居世界前列。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第6，其中服务业产值占其GDP的70%以上。伦敦与纽约、东京一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三大中心，和纽约并称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即便在近年的经济衰退中，据世界经济论坛测算，英国经济的竞争力排名仍呈回升之势，在2011—2013年中分别居全球第12、第10和第8位。排除排在前列的瑞士、新加坡和芬兰等小国，在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大国和潜在大国中仍位居第3或第4，仅次于美、德、日三国，2012—2013年度更是超越日本排名第3。^②

自由主义是英国经济的重要理念。历史上英国较早参与殖民地掠夺，从中获利颇丰，19世纪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控制了全球的金融与投资，经

^① The Conservative Party: *2010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 <http://www.conservatives.com/~media/Files/Activist%20Centre/Press%20and%20Policy/Manifestos/Manifesto2010>, p.103, last accessed on 8 October 2012.

^② 参见世界经济论坛网站2011—2013年各年年度报告, <http://www.weforum.org/issues/global-competitiveness>。

济更加依赖世界市场。在其经济全盛时期关于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争论中，英国于 1846 年废除了《谷物法》，为相对开放的世界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促成了 19 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第一次全球化的黄金时期的形成，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从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看，英国长期经历了作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严重程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的“英国病”。^①虽然借助撒切尔革命和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改革，从 1995 年起英国经济开始了 13 年的稳定增长的黄金时期，^②但就在许多英国决策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英国已找到救治“英国病”的良方之际，从 2008 年起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英国经济出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当前，英国经济呈现出衰退长期化、复苏乏力的特点。长期以来，英国经济过度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业、实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持续衰落。危机表明这一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面临艰难转型。而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英国被迫实行的紧缩政策使这一转型尤为艰难。

（三）文化力量

二战后英国首任工党首相艾德礼曾将英国的衰落归咎于重玄理，轻实业，忽视制造业、工程技术和技能培训的传统，今天许多人也为英国战后未能像德国一样保住本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惋惜。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英国文化创意和生产却在 20 世纪实现了迅速发展，成为重要支柱产业。目前，英国是世界创意产业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根据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2010 年的数据，英国创意产业领域有 18.2 万家企业，就业人数 130 万，在其他行业中也有 100 万人从事与创意产业相关的工作。该产业为英国创造的 GDP 达到

^① 罗志如和厉以宁先生认为，“世界工厂”的遗产，殖民帝国的后果，“福利国家”的负担，“传统精神”的枷锁，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现代英国经济特有的所谓“英国病”。参见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② 这一阶段英国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 3% 左右。

590 亿英镑。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创意产业的增长速度是其他经济部门的两倍，成为增强英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与比较优势的重要部门。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近期的研究显示，英语、教育和文化是支撑英国在海外声誉的三个首要因素，^① 提高了英国的国际吸引力。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广播在全世界有 1.8 亿听众，是国际传媒的全球领导者。今年适逢简·奥斯汀创作《傲慢与偏见》200 周年，有评论指出，这部小说已经启发了从好莱坞到宝莱坞的几十种改编作品，创造了上亿英镑的经济增加值，也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名片。而 2012 年英国《单片眼镜》杂志更是借伦敦奥运会、女王钻禧庆典和邦德电影的成功将英国推上了该年度全球软实力排行榜的榜首。^②

（四）关于英国力量的其他相关概念

关于英国力量话语的另外两个重要概念是软实力和道德性力量。相比更偏重物质性的硬实力，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塑造其他国家偏好的能力”，是一种吸引力。^③ 拥有软实力的行为体在实现其国际目标时遭遇的阻力更小。软实力一直以来都是英国力量的重要来源，约瑟夫·奈本人甚至也认为这一理念是英国人的发明，他讲道：“这个概念不是新鲜事物，是人类行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发现了它，并且自 1934 年以来就一直有效地进行实践。”^④ 近年来，通过树立国家品牌、开展公共外交、构建国家形象也成为英国提升自身国际影

① British Council, “Contribution to UK soft power”, 24 September 2012,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about/contribution-uk-soft-power>, last accessed on 14 November 2012.

② “Britain Ousts the U.S. as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Nation: Country Tops Rankings for ‘Soft Power’”, *Mail Online*, 18 November 2012,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234726/Britain-tops-global-soft-power-list.html>.

③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5.

④ Joseph Nye,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1 Century”, British Council Parliamentary Lecture, 10 January 2010, <http://www.docstoc.com/docs/40687874/Soft-Power-and-Public-Diplomacy-in-the-21st-Century>, last accessed on 25 February 2013.

响力的重要途径。

另一个概念是英国的道德性力量定位。考虑到英国有限的经济和军事资源，道德维度一直是自丘吉尔以来英国努力超越自身资源条件限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新工党在科索沃危机、伊拉克战争中首先提出“人道主义干预”概念，到大卫·卡梅伦在利比亚的军事干预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然而，如同积极推行道德外交的其他西方大国一样，历史上殖民主义的不光彩纪录和将自身价值、规范强加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时其成效往往大打折扣。而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使英国在推行道德外交的过程中包含了更多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限制了这一力量的发挥。

二、在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并存的时代应对 “中等力量危机”：近期的争论与新挑战

西方经济与债务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加速了国际权力结构调整的进程，使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传统强国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世界现代史上第三次大国力量调整的进程之中。第一次是大约 15 世纪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 19 世纪美国的崛起。当今的第三次则可称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① 作为 19 世纪国际体系的领导国，英国在 20 世纪较之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更为严重的相对衰落过程。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开启之际曾写道：几乎所有的中等强国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即自己是谁、战略重点如何、怎样实现战略目标的问题。^② 对英国而言，这一命题尤为关键。一些外部观察家认为，英国最终接受其衰落的现实和全球体系中的中

①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Rest”, *Newsweek*, 12 May 2008.

② Paul Kennedy, “Britain: A History Lesson”, *The Economist: The World in 2010*, 2009, p. 51.

等力量定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应收敛其战略野心，安于作为地区性中等力量的角色。然而，对英国人来说，是否接受这一中等力量的定位远未达成共识。英国力量定位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已成为英国决策者和学术界辩论的焦点。

即便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英国政府仍认为可以利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英国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与智慧充当全球领导者的角色。^① 在 2011 年利比亚危机中，英国不顾自身经济和财政上的困境，与法国联手扮演了对利军事干预的主要推动力量和执行者的角色，也是其追求确保英国全球大国地位的战略意图的体现。2010 年英国各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都明确了确保英国全球大国地位的目标。联合政府执政后，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即表示英国不能接受“中等工业化国家”或“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力量”的定位。2012 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56% 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应寻求维持其大国地位。这些辩论凸显了英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的理想与现实、能力与预期、资源条件与战略雄心之间的差距。

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英国政府关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个基本判断。^② 一些学者也认为，国际权力的转移将导致一个多极、甚至无极世界的出现，多个权力中心共同存在，或者不存在任何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权力中心。经济困难的长期化加速了国际力量重新分配的过程，经济、金融、能源和环境等危机前所未有地呈现出来，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独自面对这些挑战。^③ 这对

① 2008 年 11 月，时任英国首相布朗在世界各国中首先做出救助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决定。他宣称，英国在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方面为世界做出了表率，其他国家应效仿英国的做法，采取类似措施。参见“Brown Leading World out of Crisis”, *Financial Times*, 11 November 2008.

② Alex Ellis,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hatham House, 26 September 2011, <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Meetings/Meeting%20Transcripts/260911ellis.pdf>, last accessed on 22 February 2013; HM Government, *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m7953, October 2010.

③ Giovanni Grevi, “The Interpol World: a New Scenario”, Occasional Paper no. 79, 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Paris, June 2009.

英国而言意味着机会与挑战并存。考虑到其经济影响力、军事力量、文化遗产、创新能力及在联合国、欧盟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及与英联邦、前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联系，英国仍有机会继续展现有形的力量与无形的吸引力。因而，如能有效管理衰落，在欧美之间左右逢源，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英国仍有机会和潜力扮演大国角色。^① 在英国的战略选择中，英美、英欧关系无疑是英国可资利用的最重要的两对战略关系。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欧债危机的影响及英国对欧政策的特殊性都增加了英国利用这些资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②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群体性崛起，也使英国加强与这些新兴国家的双边关系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新重点。

当前英国对外政策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是如何处理与欧盟的关系。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英国不被视为单独存在的大国，而是欧洲的一部分（欧洲构成了五个经济与军事中心之一）。过去十几年中，尽管英国与欧陆国家在伊拉克战争、条约改革等问题上龃龉不断，相对亲欧的托尼·布莱尔政府对欧推行建设性接触政策，努力发挥领导作用，英国与欧盟关系总体平稳。英国虽未扮演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主动推动者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法德英三大国共识取代德法轴心的新体制，成为影响欧盟一体化走向的重要力量。伊拉克战争期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批评政府政策时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严重的不合时宜的战争。它鼓励了这样一种错觉：英国重新占据了全球性角色，……并掩盖了这样一个现实，即英国的命运在欧洲。”^③ 在欧债危机迁延不愈的背景下，欧盟与英国都站在十字路口。一些欧

① Justin Morris, “How Great is Britain? Power, Responsibility and Britain’s Future Global Rol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2011, pp. 341-342.

② 参见 David Kerr, “The Changing Faces of Atlanticism and Europeanism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s Strategy for China”, 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第七届年会发言，北京，2012年11月16日。

③ Robin Cook, *The Point of Departure*,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03, p. 132. 转引自 David McCourt, “Rethinking Britain’s Role in the World for a New Decad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2011, p. 145.

盟成员国认为深化一体化是走出危机的途径，但危机的倒逼效应在英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关于英国去留问题的辩论不断升温不仅是英国疑欧主义发展使然，也是欧盟力量演变迫使英国做出回应的结果。一方面，欧债危机导致的欧盟信任危机及其经济社会模式国际竞争力低下的缺陷削弱了英国决策者和民众对一体化的功利主义支持；另一方面，欧盟为应对危机加强自身经济治理的努力触动了英国金融资本的利益，使英国在欧盟中陷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特别是2013年1月卡梅伦发表关于英国与欧盟关系的讲话，承诺保守党如赢得下次大选将在2017年底前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决，使多年来欧洲怀疑论者脱离欧盟的设想变为了现实的政治议题，也使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

另一挑战则来自英国经济社会治理和民族国家的未来等层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金融业首当其冲，并迅速向其他产业传导。这一危机标志着始于撒切尔革命并为新工党所接受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蜜月期的终结。^① 英国经济面临紧缩政策和刺激增长间的矛盾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外部挑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衰退长期化的风险。为应对困境，英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制造业、发展创意产业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清洁能源等低碳经济产业，借助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英国长期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国家和私人负债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疲软，特别是制造业长期衰落，加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及国内紧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都加大了英国产业转型的难度。紧缩政策对英国社会发展的一些不利影响也开始显现。首先，削减福利的计划加剧了英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其次，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英国一些社会矛盾出现局部激化的迹象，如2010年11月针对增加学费和削减教育补贴的抗议活动、2011年8月托特纳姆爆发的英国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以及2011年11月英国32年来最大规模的公共部门大罢工。再次，长期的紧缩政策对英国社会团结和地区、种族、阶层关系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英格兰人认为苏格兰等地区的居民占用了过多

^① P. W. Preston, *Engl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1.

的公共财政资源；穆斯林等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下降；战后英国历届政府积极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民族融入政策面临挑战。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并开启苏格兰独立公决进程。在苏格兰人复杂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经济利益考虑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尽管到2013年初相关民调显示苏格兰人支持独立的比例仅占1/3左右，2014年公决导致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一发展开创了苏格兰独立公决的先例，并赋予其合法性，给英国政府推行的权力下放政策和英国民族地区自治的发展带来的长期影响仍不容低估。

三、立足中国的多学科、跨学科视角： 英国力量演变研究的新议程

在西方学术界，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物质因素和思想、政策与核心原则等制度因素哪些是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力量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政策与经济发展是否匹配是其中的关键。英国物质资源对其国家力量发展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如何避免其政策安排和经济发展的失衡，发挥思想、政策的最大化效应，为进一步发展留出的空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当前国际力量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英国更加重视自身的软实力建设，其国际影响力更多从器物层面向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制度和思想层面转移，如积极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建构，争夺国际话语权，突出其国际金融、政治与安全体系中的影响力；更加注重在低碳经济、创意文化产业等领域形成的独特的比较优势等。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近年来，中英关系发展平稳，笔者认为英国在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特别是在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领域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如2012年，中英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成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四个高级别官方人文交流机制之一，也是迄今与欧盟成员国建立的唯一的一国别人文交流机制）；中英贸易额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增长幅度最大，中

国对英投资并购高速增长，2012年超过过去10年的总和。但2012年卡梅伦会见达赖也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提出了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如何相互维护和尊重重要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命题。

作为中国学者从外部观察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努力，这一研究不仅关注英国自身发展的轨迹，而且需要将其置于中英关系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广阔视野之中，探究英国力量演变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为此，需要聚焦（一）英国力量与国际地位的历史演变与当代挑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英国维持自身大国地位的努力及面临的困难，关注中英关系在政治、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新变化、新发展；（二）英国内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对英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如英国民主制度的决策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战后首次出现的联合政府的运作、穆斯林、华人移民群体融入英国社会的现状与问题、英国的语言、文化政策与国家认同建构等；（三）文化传统和创意产业在英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中的作用，特别是英国文学、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这些作品所反映的英国社会阶层、种族关系、生态意识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启示等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超越英国力量及其在世界中地位研究仅仅是国际关系问题的思维定势，跨越学科的藩篱，发展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议程，不仅关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演变，也关注经济力量对英国国际地位的长期影响，同时将众多有形与无形的力量要素纳入这一研究议程，如作为力量资源的语言、文化要素、跨文化交流和人文交流的影响等。这一跨学科研究不仅意味着研究内容的拓展，也包含方法的融合与创新。开展相关研究需要历史学家对细节的追求、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智慧和灵感；需要政治学家的高度理论概括和经济学家精确定量计量工具的使用；需要社会学家对个人、群体行为的关注，使我们的研究避免宏大叙事中过于简单化的弊端；也需要在对两国文学、文化作品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阐发关于中英文明交流的思考，增进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与认知，推动人文交流。在英国力量演变研究中注重中国视角，关注英国力量演变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意义也是中国学术界开展这一

研究的应有之义。

在此过程中，包括国内英国研究学术团体和英国研究中心在内的学术机构将发挥关键作用。除英国史、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学科开展的研究外，多学科、跨学科综合性国别研究中心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这些学术机构的作用不仅在于为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论坛或交流平台，而且能够提出和推动有意义的多学科研究议程，促进各学科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这对深化英国力量演变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